话说中国

# 百 年 记 忆

卷十四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 目　录

拨乱反正后的外交 …… (1)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简要回顾 …… (1)
80 年代初期中美联合抗苏局面的形成 …… (5)
里根政府第一任期 8·17 公报与
　　中美两国相互政策的调整…… (10)
80 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基础的动摇危
　　及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17)
布什政府后期的中美关系…… (26)
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 (28)
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 (36)
“只要我还活着,就享有香港的主权!”…… (36)
毛泽东深思熟虑:收复香港要等待时机 …… (39)
《人民日报》号召解放香港…… (43)
智斗“铁娘子”,邓小平言香港主权不容讨论! …… (46)
“不能在香港驻军,那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51)
“光荣撤退”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55)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 (62)
从小岗开始的农村巨变…… (62)

“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69)
企业的扩权试点,渐进式改革的最初切入点 …… (73)
流通体制的初步改革和
“流而不通”局面的初步改观…… (79)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扬起所有制改革的大旗 …… (85)
引入市场因素的最初探索…… (91)
经济的全面活跃和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97)
农村的崛起与城市的变革 …… (101)
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 …… (101)
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 (106)
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双管齐下 …… (112)
百万大裁军——军队体制改革
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 (118)
农村改革再上新台阶 …… (123)
经济对外开放的决策与新格局 …… (136)
改革的历史坐标:中国处于初级阶段…… (136)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43)
全面改革带来经济的加速发展 …… (152)
改革与开放的双子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156)
“杀出一条血路”:试办经济特区…… (161)
沿海大开放 …… (165)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与“洋浦风波” …… (170)

# 拨乱反正后的外交

## 70年代中美关系的简要回顾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后终于建立起新的关系不能不说是7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战后美国外交史的一个惊人的转折。

中美和解的战略意图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中，双方在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地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声明微妙而又明文地表明了中美两国反对苏联推行扩张主义的共同利益和立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和立场为中美两国在70年代初实现和解，同时也为70至80年代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尚不具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在1972年中美建立起新的关系后，美国国内的亲台湾势

力依然十分强大。美国政府担心，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会使它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麻烦。此外，在尼克松政府尚未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尼克松本人即因“水门”事件而在他第二任期的中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继任的福特政府在“水门”事件阴影的笼罩下，政治地位比较虚弱，缺乏足够的力量在中美关系上采取坚定步骤，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还要受美苏关系的制约。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是从属于它的对苏政策的。对美国来说，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总是高于美中关系。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积极推行对苏缓和的政策，它不希望中美和解的进程危及美苏缓和。因此，不仅中美和解的结果并未完全形成两国联合一致对付苏联的局面，而且中美关系在尼克松第二任内以及在福特政府时期出现了某种停滞不前的现象。

1977 年 12 月上台的民主党卡特政府继续奉行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宣称其对华政策仍将以上海公报的原则为指导，并表示将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作为它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卡特政府继续推行对苏缓和。它原先打算先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议，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卡特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相比，在卡特的外交日程上仅居次要地位。政府发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也特别明显。以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苏强硬派主张利用“中国牌”来推动美苏关系，而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对苏缓和派不希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美关系的发展妨碍美苏缓和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

1978年起，形势的变化迫使卡特政府调整外交部署，开始对苏联采取较前强硬的路线。这主要是由于70年代后期，苏联利用缓和加紧在第三世界推行扩张，从而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政府决定提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1978年4月，卡特总统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同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同我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并不把它同中国的关系看作权宜之计，美国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美国也有这种决心。”他还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双方于1978年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建交公报和同一天发表的两国政府声明中，美国除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接受了“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同时，美国又声明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将同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并再次强调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心。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则强调，解决台湾回归

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而且为70年代末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形势下中美联合抗苏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由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双方签署了民航协定、海运协定和纺织品协议。中美贸易显著增长，文化科技交流迅速开展。然而不久，美国方面很快从建交公报所宣布的立场后退了。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放弃它在台湾利益。为继续维护这一利益，同时也为平息国内的政治争论，减轻卡特政府的政治压力，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与台湾关系法》。3月1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予以通过。4月10日，卡特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成为美国法律。《与台湾关系法》多处违背中美建交协议。该法表示要保护台湾，继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这就在实际上使美国继续为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从而以变相方式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该法的实质是要继续把台湾当作一个“政治实体”，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从而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并为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一个严重的障碍。

# 80 年代初期中美联合抗苏局面的形成

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国在同苏联对抗中的地位，但是卡特政府在利用“中国牌”对付苏联方面仍然是有限度的。除了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卡特政府并未放弃对苏缓和的方针。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需要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便在中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卡特本人则希望继中美建交和埃及以色列和约之后，通过同苏联达成协议并实现美苏首脑会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下届竞选连任创造条件。

其次，卡特政府打“中国牌”的做法还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苏联批评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种十分轻率的方式”，指责卡特对华政策是“目光短浅和危险的”，并警告美国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提醒美国进一步密切对华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

此外，卡特政府内部仍然意见分歧。布热津斯基相信同中国建立抗苏联盟将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地位，因而主张在利用中国因素对付苏联方面应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包括放宽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限制。万斯尽管不否认中美关系对制约苏联行为的作用，却认为应当谨慎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他主张放慢中美关系发展的速度，尤其不要同

中国建立反苏联盟，并在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问题上维持现状。他竭力设法使美国在处理与苏中两国关系时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印象，并尽量减少对美苏关系的损害。

中美建交以及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对卡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人是一个胜利。可是，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一事在卡特政府内部重新引起了争论。卡特政府对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既不持完全中立的立场，也未给予中国无保留的支持。它的方针是不让中越冲突影响美苏或美中双边关系。为此，它与苏联重开战略武器谈判，并于1979年春同苏联达成协议。6月，美苏首脑会晤在维也纳举行。

从1979年下半年起，卡特政府的对苏与对华政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8月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平行的战略利益”，并表示任何国家要想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削弱或孤立中国的立场，将“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

9月份，美苏两国，就苏联作战旅驻扎在古巴一事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对卡特政府为使参议院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双重的打击，并给美苏关系投下了阴影。尽管卡特政府不愿采取过激的态度，它也不得不作出某些强硬姿态，其中之一是决定初决与中国建立公开的军事关系。白宫还提前宣布了国防部长布朗将访问北京的消息，并暗示他将同中国方面讨论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技术事宜。不久，卡特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楼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份主张向中国提供军援的秘密研究报告，以此对苏联施压。

1979 年 12 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苏关系新的危机。阿富汗事件使卡特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为此，他除要求参议院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制裁苏联的措施。苏联的行为迫使卡特政府重新考虑其整个对苏战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卡特主义”的提出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宣告了美苏缓和时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时期。

“卡特主义”提出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然而，它还有着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实际上，自 1978 年以来，苏联加紧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并利用波斯湾地区的动乱直接威胁到西方赖以生存的石油产区和战略通道，使美国意识到推行缓和政策的消极后果，并开始酝酿调整对外政策。

1979 年 11 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又使美国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伊朗危机是美国国力日衰和放弃战略优势的结果。它表明美国在同苏联对抗中处于软弱地位，在对付第三世界动乱的挑战中束手无策。从美国国内看，70 年代政治思潮日趋保守也为卡特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准备了条件。美国两党和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增加军费，保持强大的国防，改变美国的软

弱形象，在同苏联对抗中采取强硬姿态，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苏联入侵阿富汗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声称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中国还决定取消四个月前开始的中苏谈判。美国则更加重视中国在抗苏中的作用，决心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把两国的合作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扩大到防多领域。

1980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布热津斯基在布朗访华前夕表示，苏联人侵阿富汗赋予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义”。他指出，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联行为作出反应的“主要办法”。布朗在访华期间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国准备在逐项基础上向中国出售包括地面雷达等非致命性军事装备。在布朗访华后，美国商务部在出口类别上把中国“Y”类（苏联的盟国属于这一类）改为“P”类，从而允许中国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包括直升飞机、高技术电子计算机和通信设备。

但是，卡特政府内部在对苏与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并未因阿富汗事件而消除。国务卿万斯仍然没法限制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以免引起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布朗访华后，他在一次谈话中承认中美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会有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但强调这种一致行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任何军事联盟或类似的关系”。

1980 年 4 月，万斯在卡特政府营救被扣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的行动失败之后，宣布辞去国务卿职务。万斯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卡特政府中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那一派的力量。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苏强硬派在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上取得了胜利。尽管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摩擦，卡特政府最后一年，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达到了高峰，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终于形成。

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又使他们对中国存在深刻的偏见。他们要求采取行动来改善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改正卡特政府“亏待台湾”的做法。早在竞选期间，里根即允诺要使美国与台湾重建“官方关系”。里根执政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此后，中美关系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两国相互增设领事馆，双方高层官员继续互访，经济、文化与科技关系也有新的发展。但里根也作出了一些损害中美关系的事情。他上台后不久，即主张增进与台湾的关系，反对以牺牲台湾的利益来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并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里根政府还批准了国会对 1961 年援外法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给予台湾每年不超过 2 万名移民的签证限额，实际上把台湾作为“单独的外国”看待。

1981 年下半年起，中美之间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里根政府不顾中国方面一再作出强

烈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所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还有所升级，包括准备出售一种先进的 FX 战斗机。在 1981 年 9 月 30 日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后，中国认为，美国继续这样做只能增加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国务卿黑格企图用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包括放松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武器的办法来换取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升级的谅解。但中国并不想进行这样的交易，在美国就售台武器问题作出让步之前，中国不愿同美国发展军事关系。1981 年 10 月，外交部长黄华在访问华盛顿时，提出要美国承诺在五年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并表示中国已作好了不惜使中美关系降格的准备。

## 里根政府第一任期 8·17 公报与中美两国相互政策的调整

里根是在美国国内保守思潮兴起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重新进入激烈对抗的背景下，打着“重振国力”和“扩军抗苏”的旗号上台的。他一开始即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在大力振兴经济的同时，加速发展军事力量，并把同苏联的对抗，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定为对外政策的核心。里根的右翼保守立场还给美苏关系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称苏联为“邪恶的帝

国”，从而使美苏言词战升级，冷战气氛重新加剧。

里根上台之初，对华关系在他的外交日程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是，美苏关系重新进入激烈的对抗使里根政府对利用中国因素来实现对苏政策目标的做法很感兴趣，因而支持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针对苏联为目标的中美关系。里根政府的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卡特政府后期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华政策的继续。在里根政府的决策班子中，它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热衷于推行这一政策。黑格认为，中国“在战略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他是里根政府内“联华抗苏”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里根政府“联华抗苏”的政策与里根本人强烈的反共意识并不完全一致。里根及其决策班子中以国家安全顾问里查德·艾伦为代表的新台派对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苏联扩张的威胁和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使他们重视同中国的战略合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达成一项协议，才能使售台武器问题得到解决，从而把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推进。1982 年春，中美谈判陷入僵局。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承诺在售台武器的性能与数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后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并在五年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方面同意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表示将逐步减少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但不愿承诺为完全停售武器规定期限，并坚持要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及至 1982 年 8 月，在经过紧张艰巨

的谈判之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发表了著名的 817 公报。中国政府在公报中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原则立场。美国政府则重申：“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方面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公报也是双方相互妥协让步的产物。它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渡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消除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障碍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 80 年代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2 至 1983 年是中美两国相互调整政策的时期。双方政策的变化对 80 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2 年前后，中国对其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主要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从而在实际上改变了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那种联美抗苏的战略，开始推行在美苏两国之间持较为平衡的政策。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

（一）自 70 年代末起，中国把国内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实行开放与改革。为此，中国希

望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以便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中国看到了美苏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认为美国在里根领导下，正在重振国力，而苏联的全球影响则因面临内外困难而下降。因此，苏联已不再如70年代那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三）进入80年代，美苏再度激烈对抗，中国既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又不愿卷入美苏冲突，相反感到执行独立自主方针将使自己在同美苏两国打交道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四）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还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某种失望情绪。

中国把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要使美国同台湾关系升级和里根政府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视为美国方面在中美关系上的倒退。

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结果之一是适度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中国不支持美国在80年代初期对波兰危机采取的政策。中国还在有关第三世界的一些问题上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中使用“美霸”的提法指责美苏在世界各地的争夺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开始着手改善对苏关系。1982年初，苏联对华政策开始松动。3月份，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中发出了要求同中国和解的信号。中国方面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响应。在勃列日涅夫承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提到苏联是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1982 年 10 月，中国同意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的磋商。由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

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美苏之间奉行“等距离”的政策。出于战略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利益的考虑，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在战略上继续同美国保持合作（尽管不再提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坚持以消除三大障碍（即阿富汗、柬埔寨和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军问题）作为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中美关系继续处于优于中苏关系的状态。

自 1983 年起，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也逐步有所调整。一方面，里根政府继续强调建立牢固与持久的中美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的重要性。1983 年 5 月，里根政府决定把中国作为美国的“非结盟的友好国家”对待，并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Ⅳ”类国家改为“Ⅴ”类，从而进一步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里根本人也从执政初期的亲台保守立场逐步向美国两党主流派一致支持的对华政策靠拢。这个政策就是既重视同中国发展稳定关系，强调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同时又不抛弃“台湾老朋友”。

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对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作用的估计发生了重要变化。1982 年 7 月，乔治·舒尔茨接替黑格任国务卿以及他于 1983 年 2 月访华是里根政府调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